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 主办

近代文化研究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第一辑



商務印書館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 主办

近代文化研究

郑师渠 

第一辑

主编 郑师渠 史革新

商务印书馆

200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文化研究·第一辑/郑师渠,史革新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ISBN 7-100-05336-6

I. 近… II. ①郑… ②史… III. 文化史—中国—近代—文集
IV. 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275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近代文化研究

(第一辑)

主编 郑师渠 史革新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5336-6/K·983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700 × 1000 1/16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0 1/2 插页 1

定价:31.00 元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顾问

刘桂生 清华大学
李文海 中国人民大学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
龚书铎 北京师范大学

主编

郑师渠 史革新

委员

王先明 南开大学
史革新 北京师范大学
孙燕京 北京师范大学
李长莉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 帆 北京师范大学
张昭军 北京师范大学
房德邻 北京大学
胡伟希 清华大学
郑大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郑师渠 北京师范大学
桑 兵 中山大学
黄兴涛 中国人民大学

封面题字 欧阳中石

发刊辞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她以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独具特色而在世界人类文明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与历史历来倍加珍惜,以致许多贤哲硕学称中华文化为“民族生存之命脉所在”、“国家发展之精神动力”。故此,历代仁人志士,殚精竭虑,著书立说,留下有关阐释中华文化的史著,浩如烟海,美不胜收。然而,揆之以往关于文化史的研究,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多偏重于古代文化史方面的研究,而对于近代文化则关注不够,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史研究中的憾事。

中国近代文化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近代文化是在其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相对于古代文化而言,整个近代文化体系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前进的、活跃的、生气勃勃的。尽管近代时期的新文化并不成熟,但没有它,就不会有后来的新文化,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近代文化是连接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桥梁。正由于此,6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加强包括近代文化史在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问题。然而,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干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学界关于近代文化的研究未能充分开展,研究成果寥寥。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学术界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蓬勃开展起来,并很快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召开各种不同议题的学术讨论会,发表大量研究成果,开拓出研究新领域,而且在高校开设中国近代文化史课程,培养本科生、研究生,形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改革开放20余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无论是从数量与质量上看,还是从涉及领域的广度与深度上看,都已经今非昔比,令人刮目相看。

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为研究者提供一个研讨学术的论坛,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经过将近两年的精心筹备与策划,终于推出了《近代文化研究》辑刊。

本辑刊的主办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于2004年1月,是北京师范大学首批重点建设的七家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团队之一,主要依托于历史学院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和中国现代史教研室。1984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同仁,在龚书铎教授的带领下,以勇于创新的精神及时调整学科研究重点,把中国近代文化史作为新的研究方向,率先成立了专门性的研究机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此后20余年间,研究团队致力于中国近代文化研究,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一切,都为今天创办《近代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学术积累。

《近代文化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专刊各种阐述中国近代文化问题的学术论文、笔谈、书评及学术信息,融会各家观点,推陈出新,努力为推进中国近代文化的研究而作出新贡献。

《近代文化研究》开设专论、丛谈、文献研究、文化交流、海外文化研究、探索与争鸣等栏目,力求全面反映学界研究状况,准确把握学术前沿,力争把本辑刊办成展示学科研究最新成果的一个窗口。

《近代文化研究》暂拟每年出版一辑,每辑30万字左右;诚挚欢迎广大读者给予热情支持,不吝赐稿。

我们诚恳地将本刊首辑奉献给广大读者,殷切期待着来自各方的宝贵批评和建议,以期辑刊精益求精,为繁荣祖国的学术园地、弘扬中华文化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编 者

2006年9月

目 录

学术史

- 龚书铎等:清代理学的分期、特点及历史地位…………… 1
- 李帆:汉宋关系与嘉道之际的学术转换…………… 28
- 史革新:晚清程朱陆王之辨…………… 57
- 罗检秋:国学与汉学——清末民初学术传承的再探讨…………… 83

民族精神论

- 陈其泰: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员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 120
- 郑师渠: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 134

文化与社会

- 胡伟希: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保守政治与知识分子运动…………… 156
- 张昭军:科举制度改废与清末士人阶层的分流…………… 178
- 林辉锋:马叙伦与民初北大的新旧之争…………… 200

中外文化交流

- 刘桂生:关于“中西交会,古今贯通”…………… 222
- 王晓秋:晚清王治本的日本漫游与文化交流…………… 230
- 王先明、张海荣:晚清“中体西用”论的再思考…………… 236
- 郑大华:论“东方文化派”…………… 251
- 黄兴涛:自省与“他者”:明恩溥与清末民国的民族性改造话语…………… 285

Contents

Academic History

- The Division, Character and Historical Status of Neo-Confucianism in Qing Dynasty Gong Shuduo etc. (1)
-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Han and the Song Schools and the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in Jia-Dao Regime Li Fan (28)
- The Difference of Cheng-Zhu and Lu-Wa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 Shi Gexin (57)
- National Studies and Qian-Jia School's Textual Criticism; A Further Discussion about the Academic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during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Luo Jianqiu (83)

Discussion on National Spirit

- The Ideological Mobilization of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the Cohesiv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en Qitai (120)
- Liang Qichao's Discussion on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 Zheng Shiqu (134)

Culture and Society

- Conservative Politics and th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the Half of 20th Century in China Hu Weixi (156)
- The Reform and Abolishment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Diversion of Scholar-Offici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	Zhang Zhaojun(178)
Ma Xulun and the Argument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Schools of Beijing Universit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Lin Huifeng(200)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

The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 The Coherence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oday	Liu Guisheng(222)
Wang Zhiben's Roaming in Japan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ng Xiaoqiu(230)
A Further Discussion about the Doctrine of "Chinese learning as fundamental principle and Western learning for practical u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ng Xianming,Zhang Hairong(236)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Discussion on the Oriental Culture School	Zheng Dahua(251)
Arthur Henderson Smith and the Nationalistic Discourse	Huang Xingtao(285)

清代理学的分期、特点及历史地位

龚书铎 等*

宋明理学,海内外研究者甚多,无论论著,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也多有阐发,而侯师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为系统论述之学术力作。至于清代理学虽有论著阐发,但尚乏系统性^①。鉴于此,本文拟就清代理学的历史分期、特点、各段大要及其地位、影响等问题作些探讨,以抛砖引玉。

研究清代理学史,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其历史分期的问题。

清初,儒学由王返朱或调和朱、王,由宋学返汉学。至乾隆、嘉庆间,汉学独盛,居学术主流。于是论及清代学术之发展变化者,多以汉学为脉络。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认为自顺治朝至嘉庆朝经学的衍变,顺、康二朝是“兼采汉、宋”,雍、乾、嘉三朝则“尊崇汉学,不废古训”。江藩意不在为经学的衍变分期,但判分显然。

清末,皮锡瑞著《经学历史》,认为:

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黜。说经

*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课题“清代理学研究”成果之部分内容,由龚书铎、史革新、李帆、张昭军合撰。

① 清代理学上承宋、元、明,历经近三百年,而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影响深远,因此,为后来研究者所注意。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等著作中,或多或少都有所阐述。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下卷第三编为“明末清初对理学的总结及理学的衰颓”,涉及自孙奇逢至李光地十几位的理学思想或反理学思想。钱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8册,除《清儒学案》序外,尚有理学家的学案多篇。梁启超的《儒家哲学》第五章“二千五百年儒学变迁概略(下)”,对清初至中叶的理学变迁有概要的论述。

2 清代理学的分期、特点及历史地位

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①

皮锡瑞所谓“国朝经学凡三变”,是将清代经学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初,皮氏未明言起讫,但在书中他处所举清初治经诸儒,多为顺、康时人,皆属“汉宋兼采”。第二阶段为乾隆以后,但书中他处又说,“雍、乾以后,古书渐出,经义大明,惠、戴诸儒,为汉学大宗,已尽弃宋论,独标汉帜矣。”^②一起于乾隆,一起于雍正,似不一致。然此阶段为“专门汉学”、“独标汉帜”,即所谓“乾嘉汉学”时期,起于乾隆或雍正,并无大碍。只是对于皮氏所说的“乾隆以后”,不应认为只限于乾隆一朝,而是包括其后的嘉庆朝等,与第三阶段嘉庆、道光以后的“西汉今文之学”交叉。如果细推敲,以“西汉今文之学”起于嘉庆并不准确。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始于庄存与,庄氏卒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早于嘉庆。皮锡瑞意在阐述清代经学衍变的历程,以及每阶段的特点,只就大段而言,不是专为划分时期。

与此同时,刘师培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一文中将清代汉学的变迁分为四期。他所说的四期,是以怀疑派、征实派、丛缀派和虚诬派划分,并无明确的时间断限。不过从文中的表述,大致可以看出:怀疑派约时在顺治、康熙及于雍正;征实派为乾隆、嘉庆年间;丛缀派、虚诬派则均为嘉庆、道光年间。如按时间分期,实为三期。刘师培宗古文经学,是文意在批评宗今文经学的虚诬派,认为“虚诬学派,则犹国力既虚,强自支厉,欲假富强之虚声,以熒黎庶。然根本既倾,则危亡之祸兆。此道、咸以还,汉学所由不振也。悲夫!”^③

1921年,梁启超在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将清学盛衰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四期。启蒙期的代表人物为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以及颜元、李塨、黄宗羲、万斯同等人,其时间起于顺治而及于雍正;全盛期的代表人物为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延及乾、嘉年间治汉学诸儒;蜕分期的代表人物为康有为、梁启超,即起于乾隆庄存与所复兴的今文经学派;衰落期与蜕分期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1页。

②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313页。

③ 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左盦外集》卷九,《刘师培全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346页。

同时,代表人物为俞樾、孙诒让、章太炎。由此看来,梁启超关于清学的衍变在时间上实为三期。其后,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写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分上中下三篇论述,上篇顺康年间,中篇乾嘉年间,下篇道咸以后,与《清代学术概论》的分期大致相同。

以上诸家之说,多为阐述清学的衍变,但对于清代理学的分期,也具有参考价值。

对清代理学明确分期的,是1942年钱穆发表的《〈清儒学案〉序》。他在文中将清代理学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晚明诸遗老”时期:

当明之末叶,王学发展已臻顶点,东林继起,駸駸有由王返朱之势。晚明诸老,无南无朔,莫不有闻于东林之传响而起者。故其为学,或向朱,或向王,或调和折衷于斯二者,要皆先之以兼听而并观,博学而明辨,故其运思广而取精宏,固已胜夫南宋以来之仅知有朱,与晚明以来之仅知有王矣。抑且孤臣孽子,操心危而虑患深,其所躬修之践履,有异夫宋、明平世之践履;其所想望之治平,有非宋、明平世之治平。故其所讲所学,有辨之益精,可以为理学旧公案作最后之论定者;有探之益深,可以自超于理学旧习套而别辟一崭新之蹊径者。不治晚明诸遗老之书,将无以知宋、明理学之归趋。

第二阶段为“顺、康、雍”时期:

遗民不世袭,中国士大夫既不能长守晚明诸遗老之志节,而建州诸酋乃亦倡导正学以牢笼当世之人心。于是理学道统,遂与朝廷之刀锯鼎镬更迭使,以为压束社会之利器。于斯时而自负为正学道统者,在野如陆陇其,居乡里为一善人,当官职为一循吏,如是而止;在朝如李光地,则论学不免为乡愿,论人不免为回邪,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往者杨园、语水诸人谨守程、朱桢榘者,宁有此乎?充其极,尚不足追步许衡、吴澄,而谓程、朱复生,将许之为护法之门徒,其谁信之?其转而崇陆、王者,感激乎意气,磨荡乎俗伪,亦异于昔之为陆、王矣。

第三阶段为“乾、嘉”时期:

理学道统之说,既不足履真儒而服豪杰,于是聪明才智旁进横轳,群凑于经籍考订之途。而宋、明以来相传八百年理学道统,其精光浩气,仍自不

可淹,一时学人终亦不忍舍置而不道。故当乾嘉考据极盛之际,而理学旧公案之讨究亦复起。徽、歙之间,以朱子故里,又承明末东林传绪,学者守先待后,尚宋尊朱之风,数世不辍。通经而笃古,博学而知服,其素所蕴蓄则然也。及戴东原起而此风始变。东原排击宋儒,刻深有过于颜、李,章实斋讥之,谓其饮水忘源,洵为确论。然实斋思想议论,亦从东原转手而来,虫生于木,还食其木,此亦事态之常,无足多怪。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今徽、歙间学者,久寝馈之经籍训诂考据间,还以视夫宋、明而有所献替,亦岂遽得自逃于宋、明哉!故以乾嘉上拟晚明诸遗老,则明遗之所得在时势之激荡;乾嘉之所得在经籍之沉浸。斯二者皆足以补宋、明之未逮,弥缝其缺失而增益其光耀者也。

第四阶段为“道、咸、同、光”时期:

此际也,建州治权已腐败不可收拾,而西力东渐,海氛日恶,学者怵于内忧外患,经籍考据不足安定其心神,而经世致用之志复切,乃相率竟及于理学家言,几几乎若将为有清一代理学之复兴,而考其所得,则较之明遗与乾嘉皆见逊色。^①

这段引文虽较长,但多有发人思考之处,足资参酌。

与钱穆的分期有所不同,我们认为,清代理学应分为三个阶段:一为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二为乾隆、嘉庆及于道光中叶;三为道光中叶,历经咸丰、同治、光绪,至宣统三年(1911)。

第一阶段,以人物而言,含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孙奇逢、陆世仪、陆陇其、李光地等人。此时,或由王返朱,或汉宋兼采,或由宋返汉。康熙朝虽以程朱理学为官方统治思想,而汉学一脉则在萌发。上述诸家论述清代经学的衍变,各有所宗,或汉学,或今文经学,或理学,因而其论断难免有所倾向。如江藩以顺、康时为“汉宋兼采”,貌似平列,实为以汉包宋,扬汉抑宋。其实此时期不仅汉宋兼采,还有由王返朱,或调和朱、王,而康熙帝尊崇程朱理学,以其为官方哲学,并有一批“理学名臣”,江藩均避而不谈。而钱穆重宋明理学,以理学为清儒脉络,而不赞成因乾嘉汉学兴盛而理学衰落之说,认为“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清代

^① 钱穆:《〈清儒学案〉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7~359页。

经学,亦依然沿续宋、元以来,而不过切磋琢磨之益精益纯而已。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则清代乾嘉经学考据之盛,亦理学进程中应有之一节目,岂得据是而谓清代乃理学之衰世哉?”又说:“故以乾嘉上拟晚明诸遗老,则明遗之所得,在时势之激荡;乾嘉之所得,在经籍之沉浸。斯二者皆足以上补宋、明之未逮,弥缝其缺失,而增益其光耀者也。”^①

第二阶段,乾嘉汉学盛行,理学衰颓,虽无如康熙朝之理学名臣名儒,但也有可述者。如维护宋学的桐城派之标举义理、考据、辞章,而“惠(栋)、江(永)、戴(震)、段(玉裁)为汉学帜志,皆不敢将宋儒抹杀”^②。皮锡瑞此说,除戴震批评程、朱理欲观外,其余诸人确不薄宋儒。嘉庆、道光之际,江藩撰《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扬汉抑宋,而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以攻汉学,于是由门户之见的互相诋讥进而为针锋相对的公开争论。宗汉宗宋者互相指责对方存门户之见,究其缘起,实由清初尊程朱理学者,如康熙时“理学名臣”熊赐履所撰《学统》,即为“卫道”、“明统”,以孔、孟、程、朱为道统正宗。

第三阶段,理学不论程朱、陆王,都有不同程度的“复苏”。程朱、陆王,宋学、汉学,虽仍有互相责难,但归于调和兼采。而西学传播,新学萌生,理学既对之抗拒,也不免受其影响。然理学已挽回不了其颓势,随着清政府统治的结束,理学的官方哲学地位也失落。

需要说明的是,学术史的划分阶段是相对的,不能过于坐实。阶段的划分,不过是为显示其兴衰的衍变历程,不可能机械地绝对断限。

二

清代理学沿承宋、元、明,有着自己的特点,主要特点概括如下:

(一)无主峰可指,无大脉络可寻。钱穆在《〈清儒学案〉序》中曾说:“至论清儒,其情势又与宋、明不同:宋、明学术易寻其脉络筋节,而清学之脉络筋节则难寻。清学之脉络筋节之易寻者在汉学考据,而不在宋学义理。”又说:“清儒理学

① 钱穆:《〈清儒学案〉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357、359页。

②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313页。

既无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如宋儒之有程、朱与朱、陆。”^①论断精到。诚如钱氏所言,清代于顺治、康熙时虽有一批理学名儒名臣,但多守成而少创获,实无可与明代发展陆九渊心学之王守仁相比肩,更不能与宋代理学开派者、集大成者的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相比拟。“无主峰可指”,“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洵为有清一代理学的一个特点。

(二)学理无创新,重在道德规范。清代理学,总的来说,陆王心学一系趋于衰颓,程朱理学一脉则多在于卫护与阐释程、朱之说,于学理无甚创造性的发展,而作为清政府的官方统治思想,更为突出的是纲常伦理的道德规范,强调躬行实践。康熙帝称“自幼好读性理之书”,将朱熹从原配享孔庙东庑先贤之列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颁行《朱子全书》、《四书注释》,定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但他对理学有自己的解释,曾与讲官张玉书、汤斌等人说:“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即真理学也。”张玉书回应说:“皇上此言真至言也。理学只在身体力行,岂尚辞说。”^②康熙帝所重视的是按照理学的道理去“身体力行”,“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③可以看出,他对于理学并不关注哲理层面,认为只有“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才是真理学。所谓真理学、身体力行,说到底就是对皇帝的忠诚。此后历朝莫不如此。作为封建帝王尊崇的程朱理学,无非是其统治术中所需要的工具,他们并不喜欢那些抽象谈论性理的空言,而是看中其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让臣民们忠诚于君主,为之身体力行,以达到道统和治统的统一。而“理学名臣”们自然领悟皇上的意图,表示理学不尚“辞说”,“只在身体力行”。清代理学在哲理层面无所创新,只重在纲常伦理规条的应用,不可避免地会趋于偏枯。

(三)宋学与汉学既互相贬抑又兼采并蓄。宋学与汉学的关系问题,出现于清代,明代无之。明代的问题在理学内部,即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同室操戈”。二者之间的互相排斥延续到清代,晚清罗泽南尚撰《姚江学辨》,以尊朱黜王。

谈到清代汉学、宋学的关系,很容易想到“汉宋之争”。的确宗宋学者与宗

① 钱穆:《〈清儒学案〉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361~362页。

② 《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89~1090页。

③ 《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194页。

汉学者之间存在着门户之见,甚至互相诋讥。如姚鼐,视“程、朱犹吾父师”,为卫护程、朱,不仅攻驳非议程、朱之说者,且加以人身攻击,但不能认为姚鼐完全排拒汉学。他攻驳程廷祚(字绵庄),却为其文集作序,序中虽仍不满其非议程、朱,但称赞他为“今世之一学者”,“观绵庄之立言,可谓好学深思,博闻强识者矣”,认为“绵庄书中所论《周礼》为东周人书,及解‘六宗’,辨《古文尚书》之伪,皆与鄙说不谋而合”^①。如所熟知,姚鼐主张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为一事,不过其间有“大小”、“精粗”之别,汉学虽“有善于宋而当从者”,但只能是从属于宋学,不能跨越宋学。这种宋学为主汉学为辅的主张,反映了一般宗宋学者的思想。

对于汉学家来说,其思路恰相反。汉学家如戴震者也主张“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②,但他们强调的是考核,即训诂名物制度。戴震反对“歧故训、理义二之”,认为二者为一事,其进路在由明故训以明理义。但这却是宗宋学者所不能接受的。宗宋学者认为,孟子之后孔子之道晦而不明,端赖宋儒才得以传孔、孟不传之学。而其焦点则如皮锡瑞所说,“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与朱子说经牴牾,亦只争一‘理’字。”^③从宗宋学的方东树所撰的《汉学商兑》来看,尽管他在书中点名指责许多汉学家,而其最不满者则是戴震的“厉禁言‘理’”^④。

嘉、道之际,江藩先后撰《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扬汉抑宋;其后,方东树起而回应,撰《汉学商兑》力加攻驳,扬宋抑汉。这大概成为人们所说的“汉宋之争”的标志。其实两人也没有进一步争论,《汉学商兑》刊行时,江藩已病故,他未能看到该书,也不可能给予反驳。对于他们的立门户,争道统,也不宜过于夸大,把它绝对化,应全面看待清代宋学、汉学的关系。双方都带着强烈的门户之见,各扬其所扬,各抑其所抑,只及一点,不计其余。二家所说,都不是全面反映

① 姚鼐:《程绵庄文集序》,《惜抱轩全集》,第206~207页。按程廷祚《青溪集》卷首所载姚鼐的序,与《惜抱轩全集》所收《程绵庄文集序》,内容甚有差异。姚氏《青溪集》序多称赞程廷祚,无不满其非议程、朱之辞,谓:“其心胸阔大,气魄雄毅,直欲自立于汉、唐、宋、明之后,以上接孟子之传。读之使人奋然而兴,信孟子所谓豪杰之士,绝去后来甚远。然其学虽与伊川、元晦有异,而究当于圣人之意旨,合乎天下之公心,非若舛异交争,好立纲宗者也。”二序所署时间均为嘉庆十五年,或收入《惜抱轩全集》之序作了改易。

②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709页。

③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313页。

④ 方东树:《汉学商兑》,见江藩:《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1页。

当时汉学、宋学的关系。

乾、嘉之时，汉学盛而宋学衰，虽有门户之见，但并不绝对互相排斥。尽管宋学的学术地位在下降，然而程朱理学毕竟是官方统治思想，科举考试必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据，儒者从小就濡染于是。而程朱理学所强调的纲常伦理，是儒者所遵行的。钱大昕对朱熹就很敬仰，在《朱文公三世像赞》中称：“孔、孟已远，吾将安归？卓哉紫阳，百世之师。……立德不朽，斯文在兹。”^①他之尊重宋儒，在于德行。段玉裁晚年曾追悔专注于训诂考据，“寻其枝叶，略其根本，老大无成”。他所说的“根本”，即程朱理学关乎身心伦理者^②。治经宗汉，制行宗宋，这是当时许多汉学家奉行的宗旨。及于晚清，如宗古文经学的张之洞，仍是“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汉学岂无所失，然宗之则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学非无所病，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③。

清代汉学、宋学的关系，治汉学者除去“百行法程、朱”外，在学术上也有对汉学、宋学持平、兼采的。乾嘉汉学盛行之时，被称为“汉学家大本营”的四库全书馆，其馆臣如纪晓岚、戴震等，对于汉学之短并不回护，对于宋学也不一味排斥。戴震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④《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宋儒之书，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也予以称许^⑤。乾、嘉之时的汉学家中，主汉宋兼采者不乏其人。如程晋芳治经“综核百家，出入贯串于汉、宋诸儒之说”^⑥。阮元也是“持汉学、宋学之平”，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诘也”^⑦。龚自珍称阮元是“汇汉、宋之全”^⑧。刘宝楠治经受从叔刘台拱的影响，治汉学，也推崇朱子。

其时，主张汉宋调和、兼采的不独汉学家，宗宋学者也有之。前面提到的姚鼐，即倡合义理、考据、辞章为一事。许宗彦对汉学、宋学偏失皆有批评，阮

① 钱大昕：《朱文公三世像赞》，《潜研堂集》卷十七，第274页。

② 段玉裁：《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经韵楼集》卷八。

③ 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一三，民国十七年北平文华斋刻本。

④ 戴震：《与方希原书》，《戴震全书》（六），第375页。

⑤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上册，《经部三十五·四书类一》，第461～462页。

⑥ 翁方纲：《戴园程先生墓志铭》，《复初斋文集》卷十四。

⑦ 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擘经室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页。

⑧ 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